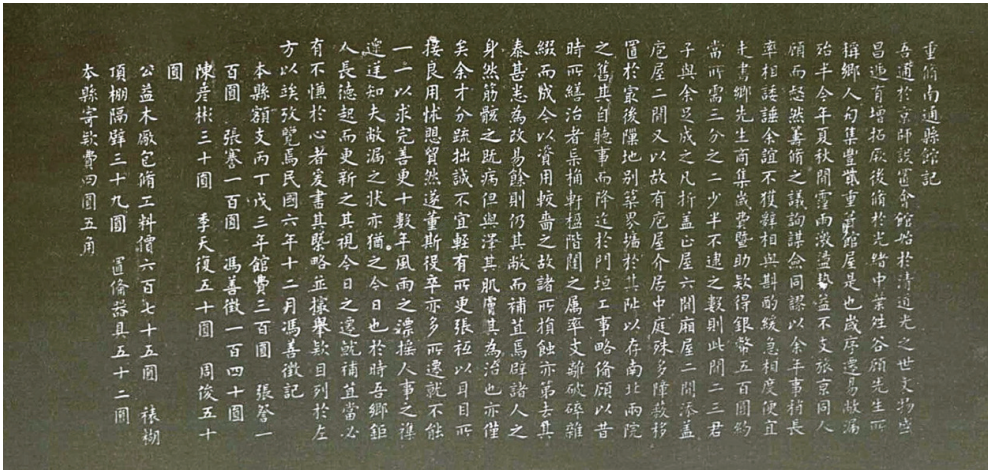


崇川往事

北京的“南通会馆”（上）

□姜松砥



冯善徵撰《重修南通县馆记》拓本

会馆，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，建有馆所，供同乡同行集会、寄寓之用。据张謇1924年语，南通“自咸同间始有皮花大量输出……棉商势力颇雄，如湖南常德等处，均有南通会馆之建设”，随后，在常州、上海等地也陆续建办了会馆。至于北京旧设各省及府、县会馆，则肇始于明永乐中，盛于清康乾间。据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统计，全市时有会馆共391处，其中，明代33处、清代341处、民国17处。而南通会馆（即南通县馆，原称通州会馆、南通州会馆）是北京众多会馆中的一个。

当年，北京会馆林立，且多集中在宣武门外，如“菜市口扬州会馆、宣外麻线胡同淮安会馆、西珠市口南通州会馆、后孙公园如泰会馆”，各会馆以同乡为纽带，结成团体，同气连枝，互为声援，遂为网络。

史载，为乡人授职来京引见及考试者提供住所，且使旅京同乡借以联络，通州会馆始设于清雍正二年（此据《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》等书说法，另有冯善徵采道光年一说）。设馆以后，旅居京城的通州人士正式结成团体，并有了一处宜于集会、居住的馆舍，为春、秋两试士人休息及旅京邑人联络乡谊等提供了便利。

会馆建立后曾经过几次维修。其一是在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，由“乡人勾集丰费重葺馆屋”。当时馆内曾有一联，以在北京各会馆中最长联语而著称：

惟淮海偏州，径隶行省，与附庸旧县，别开邸舍于兹，眷彼征人，命侑啸侣，人息腾蹻、出鸣佩珂，去澳隰卑辱而升本朝，千里因依欣聚首；
繁乡邦后进，来游上京，即布衣诸生，皆具风云之气，簪斯髦士，应科历官，内跻台司、外秉疆寄，自傲落权舆以迄吾世，百年赓续话从头。

该联作者顾曾烜（1836—1904？），字升初，号旻谷，明代蓟辽总督、兵部尚书顾养谦之后，南通州人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举人、光绪九年（1883）进士，先后任陕西合阳知县、耀州知府及宜君、醴泉知县。系晚清诗人、学者，善古文、工诗词，学问渊博，名重一时，著有《方宦寿世文》《华原风土词》《合阳杂咏》等，参修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《泰兴县志》。张謇曾有诗相赠，并为其撰《顾旻谷先生六十寿序》。

而在此之前，馆内还有一副名联，后与顾曾烜长联一起被收入《中国古今实用对联大全》等书。联曰：

庐旅乃构于京，喜戴斗瞻天，乌奕簪缨朝北阙；
文章莫大乎是，快腾蛟起凤，联翩科第冠南州。

这副饱含对家乡及进京赶考的通州子弟期待的对联，出自白蒲（时属通州）人沈歧笔下。沈歧（1773—1862），字耀西，一字显西，号鸣周，又号饴原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。官至左都御史，卒谥文清。著有《左右修竹居诗集》《味蔗存草》等。

另一次维修在1917年，时因“夏秋间，淫雨激荡，势益不支，旅京同人顾而怒然，筹修之议询谋金同”。经“商集岁费暨助款，得银币五百元，约当所需三分之二”，再加上众人资助（其中，“张謇一百元，张謇一百元，冯善徵一百四十元，陈彦彬三十元，季天复五十元，周俊五十元”），工程得以进行。此次维修，“凡拆盖正屋六间、厢屋二间，添盖庖屋二间。又以故有庖屋介居中庭，殊多障蔽，移置于最后隙地，别筑界墙于其址，以存南北两院之旧，其自厅事而降，迄于门垣，工事略修……”经此整葺，会馆重放光华。当年6月，经在京同乡公推，由冯善徵撰《重修南通县馆记》一文，后刻石立碑馆内，以记志其事。冯善徵，字子久，号达庐，精词章、算学，南菁书院高才生，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二等第一名，尝为南洋公学教员，补四川云阳县知县，后入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幕。民国北京政府时期，任统帅办事处参事、国务院秘书。著有《达庐诗录》等。

今天的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商厦中心通道之南（旧为宣武门外大街195号），便是当年的南通县馆所在地。宣武门，老北京的内城九门之一，取“宣扬武功”之意。宣武门外大街则北起宣武门内大街，南至菜市口大街。据2014年版《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》所载会馆名录，这条大街上曾会馆密集：除了195号的南通县馆，前有194号天门会馆、190号川南会馆、188号南安会馆、186号河洛会馆、165号甘肃会馆等，后有196号江西会馆等，共计22家。

关于南通县馆的概貌，有记载“是一座中型会馆，有三进院落加左右两个小跨院。馆内房屋虽不很多，但院子宽敞，后院的房子装有大玻璃窗户，很明亮”。另有资料显示，该会馆占地1.76亩，有房32间。关于会馆的管理，早年曾按“例用馆役一名，呼为长班，携眷往馆，世袭其职。乡人有庆吊事，长班供奔走，年节向各家领赏”。而在每年春季，会由掌馆人召集同乡来馆聚会一次。

旧时的“自我隔离”

□程太和

时，很多人家都把小孩带到“痘神祠”去敬香磕头，求神保佑不受天花的危害。当年的“痘神祠”城乡都有，“痘神”脸上有几粒痘疮（即“天花”）。在天花流行季节，“痘神祠”的香火特别旺盛。

大家小户都怕有人“出天花”，因此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都主动花钱请“种花儿先生”替孩子种“牛痘”，知道这是预防天花最安全可靠之法。有的贫困人家无力给孩子种“牛痘”，或因生皮肤病、发热、咳嗽等原因而未及时种，失掉接种时机，一旦天花流行，染病的小孩就多。

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们身心健康，各类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，天花已被彻底消灭。眼下，新冠病毒肆虐，相信经过一段时期努力，新冠疫情也将被有效控制与消灭。

海陵旧话

清代名医冯蒙求的传说

□韩国文

清乾隆年间，如东县双甸北乡有个名医名叫冯蒙求（1716—1797），专治天花，“人号天仙”，“矧公手援，贫者为先”，“《邑志》称公善治痘，多所全活”（《如皋冯氏宗谱》）。

天花是过去一种极其普遍又极其可怕的病疫，流行起来，危害极大。冯蒙求就是制服这种恶疾的神手。

《如皋县志》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：有一次，冯蒙求乘坐着小龙车正在路上行走，忽然遇到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儿让路在路旁，他连忙停车，叫车夫拿起车鞭子猛力抽打那个孩子。孩子大哭，并被突如其来的抽打惊吓出一身冷汗。孩子的妈妈责问打孩子的理由，冯蒙求回答说：“你的孩子暗积着严重的内热，这是要出天花的前兆。如果不把内热发出来，后果不可想象。现在好了，孩子出汗了，内毒排解了，可以安然无恙了。”

冯蒙求不要人家花一分钱，主动将孩子的病根挖除。冯蒙求到底是个怎样的医生，已经一目了然。至今在如东县西部还有一些传说将冯蒙求说得更加神乎其神。

天赐神书

冯蒙求原来就是一个医术很高明的“花儿先生”。那时候，生天花的人比较多，很多人家因为贫穷又看不起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病着死去。他总是带着一种怜悯之心，认认真真地去帮助人家治天花，碰到那些穷苦人家拿不出钱的，他就不收钱。也许就是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上帝，赐给他一部天书：一天，一场暴风雨过后，他在庭院里捡到一本书，打开来看了看，起初一个字也没有，过了一会儿，显出“有求必应”四个字。从此，他遇到难题就向这本书请教，书里教给他的方法更有奇效了。他治愈的病人越来越多，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，不仅名扬皋东地区，甚至名扬大江南北。

治愈皇子

冯蒙求生有七个儿子、四个女儿。儿女相继长大，儿子要盖房子，女儿要打嫁妆，这些都需要木料。他打算到苏州去打听打听。出发前便照例请教一下天书，答复是“不要带钱”。虽然心中纳闷，可是还是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谁料一进苏州城，满城挂着红布条。原来是皇帝南巡带来的皇子出了天花，正挂红辟邪呢。苏州城里所有的医生都没法治，皇帝简直要急疯了。冯蒙求自告奋勇地去给皇子治病，天书告诉他用人参汤解毒。一剂人参汤服下去，皇子出了一身大汗，便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。三剂人参汤，皇子就已痊愈。皇帝觉得他是一位奇医，要重赏他，还要带他到京城去当御医。冯蒙求实话实说，孩子多，离不开家。皇帝通情达理，下了一道圣旨到如皋县衙，赏给冯蒙求宅基地七处。每处盖一座瓦房，掘一眼井，给二十亩熟地。这就是给他七个儿子安排的家园：四处在冯家庄，三处在莲花池。

江南来徒

有一个年轻人在江南做生意，一次，碰到一个花儿先生仔细看了看说：“你不久就要出天花啦，要赶快治疗啊。”这个小伙子将信将疑，想到自己的家乡有个名医，不妨回去送给他再瞧瞧。这个名医就是冯蒙求，他看的结果和江南的那位医生差不多，不过他有办法治愈这个处于潜伏状态的病。不久，这个小伙子就又回到了江南，那位医生又提起看病的事儿，小伙子也就如此这般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江南医生。江南医生暗暗思忖：这位医生比我高明多了，像小伙子这样的病我虽能瞧得出，却没有办法治。他仔细打听了路线，跨江越海来拜冯蒙求为师。冯蒙求见他真诚，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，让他能够更好地治病救人。

冯蒙求的医术传了九代人，在乡村间盛行了200多年。虽然到解放以后他的治疗方法被新的医疗技术所取代，天花这种恶疾也早已被刨根铲源、销声匿迹，然而冯蒙求的故事仍在乡间流传着，他的精神还在激励着后来人。

轶闻掌故

新冠疫情期间，“自我隔离”一词十分盛行。旧时，面对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，同样也有“自我隔离”一说。以人们熟知的“天花”为例。过去，“天花”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传染病。一旦染病，轻者麻脸、重者夭亡。天花的传染性极强，过去家中有人染了天花，便在门前墙垛上贴一张红纸上“天花大喜”，以示这一家人有“出天花”。有人在家“自我隔离”，这是招呼外人“请勿入宅，以防传染”之意，客观上就起了防止传染的作用。过去，无论城乡，凡是染上天花或是出痧子的小孩，都戴一顶红布帽子以遮阳光，保护眼睛。这也是合乎卫生要求的。每当天花流行季节，不管是否出过天花的儿童，都在帽子上钉一条寸把长、几分宽的红布条，上写“天花已过”四个字，祈求不再染上天花。同